

談談文學反映社會主義新生活 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

王一之 唐庶宜 張廣明

毛澤東同志關於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給文藝創作反映社會主義新生活和人民內部矛盾指出了正確的道路，給社會主義文藝的迅速發展打開了廣闊的天地。

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學說，作家要在文學創作中正確地反映社會主義新生活和人民內部矛盾，首先就必須抓住生活中的主要的矛盾，以主要的力量去反映主要的矛盾。因為這種主要的矛盾，“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起着領導的決定的作用”，“規定或影響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所以，只有集中主要力量反映主要矛盾，才能找到問題的中心，找到解決矛盾的方法，才能正確地表現和促進社會主義新生活。

那麼，什麼是我們社會當前的主要矛盾呢？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中明確地告訴我們：“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整個過渡時期——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這種矛盾，在某些範圍內，有時表現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表現為非對抗的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矛盾又常常交錯在一起，又會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

因此，文藝創作要正確、深刻地反映人民內部矛盾，就不應掩蓋、調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應該揭露這種矛盾；就不應避開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而應該反映這種鬥爭；要描寫無產階級如何戰勝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如何戰勝資本主義道路，表現出社會主義社會如何向共產主義過渡。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就是要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人民，幫助人們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幫助人們清除資產階級的影響，消滅資本主義的殘余，從而促進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可是，于黑丁等同志卻提出了與我們完全相反的主張。

作協武漢分會在去年五月發起“關於文學創作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的討論，在‘長江文藝’六月號和七月號上發表了于黑丁的《文學要描寫矛盾鬥爭》、胡青坡的《文學作品正確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趙尋的《站在鬥爭的前列》。他們在大談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對人民內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

主义道路的矛盾却絕口不提。他們所列举的人民内部矛盾仅仅是“群众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和群众利益的矛盾，工作人员的命令主义和群众生产积极性、劳动创造性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于黑丁）“大集体和小集体之间的矛盾”（胡青坡）。他們认为：自从整风反右，“解决了敌我矛盾以后，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即大量的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基本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所以矛盾双方面都是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中的人物，无论正面或反面人物，就其本质上說都是可爱的，……他們总的政治倾向，生活态度是正确的”。（胡青坡）

他們的根本錯誤，就是从人民内部矛盾中悄悄地抽掉了階級的内容，从根本上修改了毛澤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說。按照他們的說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階級斗争已經熄灭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已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完全可以不经过斗争便和平长入共产主义。如果还有什么問題，那就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大集体与小集体之间的矛盾。如果遵照他們的意見办事，文艺創作就必然导致：一方面，宣傳階級調和，取消无产階級对资产階級的政治、思想斗争，放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陣地，讓资本主义思想泛濫成災；另一方面，則把劳动人民内部矛盾誇大成对抗性的敌我矛盾，把矛头轉向劳动人民和党的领导。可見，于黑丁等同志的主張，實質上是企图借‘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之名，引导作家走向反党反人民的道路，使文艺为资本主义政治服务，把无产階級文艺变成资产階級文艺。

在文艺創作中，有极少数的作者，也表現了一种十分不良的傾向。他們不是圍繞着两个階級、两条道路的矛盾去反映新旧思想、新旧事物的斗争，并通过这种斗争向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相反地，却醉心于描写生活中的所謂‘小事情’，把矛盾斗争庸俗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李古北同志的《破案》（載‘延河’58年10月号）和《奇蹟》（載‘火花’58年10月号）。两篇小說都是写大跃进中的事情。在大跃进中，充滿了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觀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有多少可歌可頌的新人新事啊！可是，李古北同志写了些什么呢？在《破案》中，先鋒农业社的干部和社員为了两个玉菱棒子被人扳掉，竟无中生有地認為这是反革命案件，鬧得滿城风雨；在《奇蹟》中，堂上村的干部和羣众在迎接省爱国卫生委员会檢查团时，偶然发现了一个漏网的麻雀，便不得不立即敲响‘少有的紧急警報’，全村总动员追击了两天，‘弄了个雞飞狗跳牆’。作者好象是企图通过这些‘小事情’来歌頌羣众在大跃进中的冲天干劲，但是，結果却起了相反的作用。在作者笔下的干部和羣众，不是敢想敢说敢干的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物，而是一些极端愚蠢、官气十足的庸俗人物。作者描写的完全不是什么大跃进，而只不过是一场无聊的滑稽剧。这不是对大跃进的歌頌，而簡直是冷言冷語的嘲諷；这里没有半点共产主义的气息，最多也只不过是一种淺薄的低級趣味。因此，作品不但沒有起到团结人民、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相反地，却是分裂人民的团结，降低了人民的精神品質。象这样来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当然是完全失敗的。

与这种作品相反，我們也有不少的文艺創作比較成功地反映了人民内部的两种世界觀、两条道路的斗争。影片《万紫千紅总是春》和《笑逐顏开》就是很好的例子。两个影片表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在大跃进的日子中，城市里弄中的家庭妇女再也耐不住了，她們要‘自己解放自己’，从鍋台边、洗衣盆以及各种瑣碎的家务劳动中飞出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設。

她們要走出几千年來束縛她們的‘小家庭’，參加集體生產和集體生活，建設幸福的共產主義大家庭。影片所描寫的實際上就是組織城市人民公社的前奏。從它的根本意義來說，也就是要改造舊城市，消滅城市中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痕跡，建立共產主義的新城市。對這樣重大的問題，當然不能不引起劇烈的鬥爭；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有人猶豫、觀望。《萬紫千紅總是春》中的鄭寶卿和劉大媽，《笑逐顏開》中的丁國材等人可算是反對派。儘管他（她）們由於出身、經歷、教養的不同，反對的出發點、反對的程度以及表現形式都有所不同，但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要維護‘個人幸福’的‘小家庭’，反對婦女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反對建立真正幸福的共產主義大家庭。鄭寶卿有着濃厚的封建殘余和資本主義思想，把妻女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要求妻子終生象奴僕一樣，只為自己服務。他們在上班的時候，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但是在下班以後，回到家里，卻實行統治、壓迫和剝削，並且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這種思想，可以說是几千年來的傳統的習慣勢力，甚至象丁國材這樣的工人也還受着這種思想的影响和束縛。劉大媽這個出身窮苦的勞動婦女也受到這種思想的影响，但是從她和丁國材的思想來說，還有另外的一面：從小生產者的觀點出發來理解社會主義，以為現在的生活比起解放前的生活已經很幸福了，革命已經到頂了，現在應該是‘安安靜靜’地享受這種‘小家庭’的‘舒適’和‘幸福’的時候。在他（她）們看來，有了‘社會主義’就夠了，無須繼續向共產主義前進了。在黨的領導和支持下，（《笑逐顏開》中的）何蕊英（《萬紫千紅總是春》中的）王彩鳳、蔡桂貞這些普通的勞動婦女，大躍進中的新生力量，向着那些具有封建殘余和資本主義思想的人物，向着那些‘革命已經到頂’論者，展開了堅決的、毫不調和的、持續的鬥爭。這是兩種世界觀的矛盾，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然而這又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和鬥爭。她們堅持運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正確地解決了矛盾。她們勝利地走上了生產建設的崗位，並且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先進生產者。在黨的耐心幫助下，在社會主義現實的教育下，丁國材、劉大媽、鄭寶卿等人也都認識了自己的錯誤，由反對者的立場轉到擁護者的立場上來了。於是，人人笑逐顏開，出現了萬紫千紅總是春的局面。這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共產主義思想的勝利。這是一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凱歌。

影片《萬紫千紅總是春》和《笑逐顏開》告訴我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經常表現出來，只有圍繞着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和鬥爭來反映人民內部矛盾和鬥爭，才能找到最能激動人心的重大題材，才能更好地幫助人們打垮資本主義殘余勢力，建立共產主義思想。

這兩部影片還告訴我們：正是人民內部矛盾的產生、發展以及被正確處理的結果，推動了大躍進，推動了我們社會的發展。因此，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學說，在文藝創作中要正確地反映人民內部矛盾，中心問題就是要反映這些矛盾如何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社會發展的过程，也就是舊事物衰亡和新事物成長的过程。毛澤東同志說：“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于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於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①文藝要正確反映人民內部矛盾，就必須善于發現我們社會中新生事物的萌芽，熱情地歌頌這些新生事物，促進它的成長。

关于这方面的道理,影片《三八河边》给了我们很多启发。这是一部纪录性文艺片,演员演的是真人真事,但这却是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影片反映了安徽宿县三八公社社长陈淑贞在土改后,从1952年到1958年,领导一个以妇女为骨干的互助组,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建立‘三八人民公社’。这个发展过程,是不断革命的过程,自始至终贯彻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作者既正确地表现了互助组、农业社的优越性,又适当地指出了它的局限性,有力地说明了农业社向人民公社发展的必然趋势。作者紧紧地抓住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集体劳动这些新生的萌芽,深刻地反映了这些新生事物不可阻挡地迅速发展,在生活中取得了支配地位,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突出地表现了象陈淑贞这样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物的成长,热烈地讚美了社会主义社会欣欣向荣的局面,使观众得到巨大的鼓舞。

新事物的萌芽和成长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中表现出来,而且也在一个人前后的行动和思想斗争中表现出来。譬如《笑逐颜开》中那个剥削阶级出身、嬌生慣养、輕視劳动的王丽云,在参加了劳动以后,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熔爐中,虽然是艰难地但却是逐步地、坚定地拋棄了寄生的剥削阶级的意識,在採購玻璃的工作中,表现了积极負責的精神。我們看見,在这个旧社会的‘資产阶级太太’的身上,也出現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难道这不是值得我們热情欢迎的事嗎?

在我們的文艺創作中,既出現了象陈淑贞、何慧英这样的劳动妇女出身的新英雄人物,又反映了象王丽云这样的剥削阶级出身的家庭妇女的变化;这样,就更深刻、更全面地表现了大跃进时代的精神面貌,更正确地表现了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并且起到了促进生活的作用。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又可以进一步得出結論:根据毛澤东同志的学說,文艺要正确地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反映我們的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就是要抓住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决定事物的性質的矛盾的主导方面。換句話說,就是要歌頌我們社会的光明。

有些人对‘矛盾’作了十分錯誤的理解,他們一談到文艺創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就想到揭露落后,描写黑暗,認為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揭露和批判’‘坏人坏事’。于黑丁等同志就是这种意見的代表人物。

他們說:文学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运用文学这个武器”“深刻的批判”和“揭示生活里的黑暗現象和落后状态”(于黑丁),就是要“反映人民内部的落后現象,缺点和錯誤”(胡青坡)。他們認為,只有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才是‘真实’的,如果要表現生活中的新事物,“實質上就是叫我們不看现实,粉飾太平”(赵寻);表現大跃进中人民的冲天干劲和共产主义风格,就是“給生活塗上一层粉飾现实的粉紅色的顏色”(于黑丁)。他們一致大声疾呼:文学的‘神圣职责’就是‘社会批評’,作家的‘社会責任’就是‘揭露和批判’。总之,一句話,文艺創作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不是要歌頌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而是要暴露社会主义的‘黑暗’。

“歌頌呢?还是暴露呢”?我們和于黑丁等同志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

对于这个問題,毛澤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曾經作了明确的指示。毛澤东同志說:“歌頌呢,还是暴露呢?……我說两种都需要,問題是在对什么人。……对于敌

人，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和一切人民的敵人，革命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在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並指出他們必須要失敗的趨勢，鼓勵抗日軍民同心同德，堅決地打倒他們。對於統一戰綫中各種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有聯合，有批評，有各種不同的聯合，有各種不同的批評。……至於對人民羣眾，對人民的勞動和鬥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贊揚”。⑤

然而，于黑丁等同志，不要歌頌，只談暴露。

他們這種手法也並不是什麼新創造。王實味、蕭軍、胡風、秦兆陽這一伙人，就曾這樣干過。他們的共同目的，就是要運用文藝這個武器，攻擊無產階級革命，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所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中曾經明確指出，歌頌什麼，暴露什麼，實際上還是一個立場的問題。毛澤東同志說：“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又說：“對於革命的文藝家，暴露的對象，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遺留的惡劣影響，而不能是人民大眾。人民大眾也是有缺點的，這些缺點應當用人民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克服，而進行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也是文藝的最重要任務之一。但這不應該說是什麼‘暴露人民’。對於人民，基本上是一個教育和提高他們的問題”。⑥

然而，于黑丁等同志不是要暴露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而是要暴露社會主義社會“生活里的黑暗現象和落後狀態”；不是要暴露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遺留的惡劣影響，而是要暴露“人民內部的落後現象，缺點和錯誤”。于黑丁同志是站在什麼立場講話，難道還不明顯嗎？

毛澤東同志又告訴我們：“矛盾着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⑦因此，對矛盾中的兩個方面，決不能平均看待。只有找到了矛盾中起主導作用的方面，才能掌握事物的本質，正確地認識和解決矛盾。

那麼，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在人民內部的矛盾中，先進與落後，光明與黑暗，成績與缺點，那一方面是起主導作用的方面呢？我們說，先進的一面，光明的一面，成績的一面，是主要的一面；雖然也還有落後的人物，還有陰暗的一面，工作中也還有缺點，但只這不過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是次要的一面，而且這次要的一面也正在逐步縮小和被克服。因此，文藝創作要正確地反映人民內部矛盾，要正確地反映現實生活，就必須以主要力量來表現新人新事，歌頌光明。如果文藝創作只是揭露‘黑暗’，批判‘落後’，就是說，只是反映了矛盾的次要的一面，沒有反映或者不是更多地反映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怎能算是正確地反映了人民內部矛盾呢？

我們知道，文學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現實生活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社會主義文學同社會的關係和舊文學同社會的關係，有根本的不同。社會主義以前的階級社會中，剝削階級占着統治地位，廣大勞動人民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那是一個‘人吃人’的社會，正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到處是一片黑暗。因此，那時候，文學如果真實地反映了生活，就必然是對當時社會的暴露；就必須是揭露統治者的黑暗，這也就是舊時代進步文學的進步作用，它的民主性和人民性的表現。所以說，舊文學的任務，

就是破坏旧的社会。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才可以說，文学是进行‘社会批評的武器，作家主要的‘社会责任’是‘揭露和批判’。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被打倒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被推翻了，这是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新的生活，正如旭日东升，光芒万丈，到处是一片光明。一个真正革命的、人民的作家，怎能压抑满腔的激情，不讚美这崭新的世界呢？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如果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就必然是歌颂新人新事，歌颂新社会的光明，歌颂新社会的組織者和领导者——共产党和人民領袖。新时代的新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进步作用，它的任务就在于保卫这个历史上最进步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并努力促进它的发展。新时代的作家——无产阶级的作家最主要的‘职责’，不是‘揭露和批判’我们社会的‘黑暗’，而是歌颂和讚美我们社会的光明。

手黑丁等同志因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場，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所以完全看不见历史的发展，看不见社会主义时代所发生的偉大变化。他们完全不懂得社会主义文学同社会的關係和旧文学同社会的關係已經根本不同，不懂得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同旧文学的任务的根本区别。他们生活新的时代里，仍然死死抱着旧时代的被遺棄了的‘法宝’，到处寻覓‘落后’和‘黑暗’，高談‘揭露和批判’，企图阻擋社会的发展和前进。

这样說来，我們是不是一律反对‘揭露和批判’呢？在反映敌我矛盾或者在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是不是就不需要进行揭露和批判了呢？

不，絕不是这样。“我們并不一般地反对‘揭露和批判’，問題是你揭露和批判什么人，什么事情？从什么立場和观点去进行揭露和批判？在社会主义的文学中把这种揭露批判放在什么样的地位”？

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阶级还未消灭，阶级斗争尚未結束，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很大影响，小资产阶级的可怕的习惯势力还在束縛着人們；因此，社会主义文艺就必须揭露一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敌人，批判一切妨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思想行为和消极現象，揭露和批判一切旧社会遺留下来的反动残余势力及其影响。‘揭露和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宣傳新社会中还有这許多阴暗的东西，使人看了洩气以至‘忧虑起来’；而是为了清除旧时代遺留下来的垃圾，讓新生事物更迅速地成长。赵树理同志的短篇小说《鍛炼鍛炼》，就是这样深刻地揭露批判了我们生活中的落后人物和消极現象。在这篇小说里，我們首先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小髓痛’、‘吃不饱’等人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或者是基层干部王聚海的‘八面圆’的处世哲学，都不是新社会的產品，而是旧社会遺留下来的残余影响。我們又清楚地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旧的思想，旧的势力，孤立了，失敗了；以楊小四等人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在斗争中成长了起来；取得了胜利。因此，作者虽然揭露了不少阴暗的东西，讀者看到的却是一片光明。表面上，作者是在‘揭露和批判’，實質上，却是满腔热情歌颂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鍛炼鍛炼》基本上还算是一篇比較成功地反映了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

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些什么經驗呢？就是說：不仅要揭露那些妨碍社会主义发展的坏人坏事，与一切危害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作斗争，而且要正确地分析和說明产生这些坏人坏事坏思想的根源，从而彻底否定它。不仅要恰当地指出前进中的困难、缺点和錯誤，更重要的是要清楚地說明这些困难、缺点和錯誤正在被克服和改正。不是以写‘阴暗’为主，而‘是

以寫光明為主。……寫工作中的缺點，……反面的人物，……只能成為整個光明的陪襯”。^①不是要孤立地揭露陰暗面，為揭露而揭露，而是要反映這些陰暗的東西正在逐步地被新社會的光明所代替。要使大家看到，新事物如何在與舊勢力作鬥爭中迅速成長，社會主義社會正在乘風破浪、一日千里地飛躍前進。

可見，我們所需要的‘揭露和批判’，同于黨丁等同志所主張的‘揭露和批判’根本不同。

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就可以知道，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在文藝創作中反映人民內部矛盾，就是要全面地、深刻地、正確地反映社會主義新生活。

要做到全面、深刻、正確地反映社會主義新生活，中心的問題或者說關鍵的問題，就是要成功地塑造出新時代的新英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時代的理想人物。

要描寫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和鬥爭，解決這些矛盾，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就必須要有堅強的新的英雄人物；要反映我們的社會正在不斷地向前發展，歌頌新生事物的萌芽，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人們，就需要創造出作為人們學習的模範的新時代的理想人物；要反映和歌頌我們社會的光明，就更需要創造出一大批新的英雄人物。總之，要深刻地表現人民內部矛盾，就要塑造出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新人物。有些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的作品，雖然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因為正面人物脊骨不硬，解決矛盾還不夠有力，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教育效果。上面說過的《鍛煉鍛煉》就正是這樣。

有些好心的、認識模糊的同志，把塑造新的英雄人物，表現新人新事與反映人民內部矛盾對立起來，他們認為現在“首先要反映大躍進中的新人新事，……其次才是反映人民內部矛盾”。而現在“新人新事層出不窮，作家即使每天十二小時手不停揮也只能反映‘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新氣象的百分之几而已，那里還有時間騰出一手去反映次要的現象（人民內部矛盾）呢？”^②

這種說法實際上是不符合客觀生活的邏輯的。難道大躍進中出現的很多新人新事，不正是在毛澤東同志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的指導下，正確地處理了人民內部矛盾而產生的偉大效果嗎？難道很多新的英雄人物不正是在這些矛盾的鬥爭中出現和成長起來的嗎？文學反映人民內部矛盾，不正是要首先反映由於這些矛盾的發生、發展和被正確解決而形成的空前活躍、欣欣向榮的局面，以及表現這些新的英雄人物嗎？

不錯，作家的首要任務是表現新人新事。但是，怎樣表現呢？毛澤東同志說：“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③難道新人新事不是在与舊人舊事作鬥爭中顯露出來的嗎？如果不反映新人新事和舊人舊事的矛盾和鬥爭，不反映新人新事如何戰勝舊人舊事以及在这个鬥爭中的成長過程，又怎能深刻地表現新人新事呢？

要表現新人新事，雖然不一定要通過描寫人民內部矛盾來表現（也可以通過描寫敵我矛盾來表現），但是，在目前的現實生活中，有很多新人新事確是在人民內部的矛盾和鬥爭中出現和成長起來的，有不少表現新人新事的好作品，同時反映了人民內部矛盾。杜鵬程同志的小說《在和平的日子里》以及在国际电影节上獲獎的影片《老兵新傳》就是這樣的作品。在《老兵新傳》中，生活是圍繞着兩條矛盾和鬥爭的綫索發展的。一方面：老戰、小冬子

同过去的战友周青和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另一方面是：场长老战和付场长、农学家赵松均的矛盾和斗争。在开发北大荒的艰苦战斗中，老战、小冬子不畏艰苦、勇往直前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同周青和的动摇、逃跑以至贪污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建场过程中，老战那种无产阶级战士的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与资产阶级农学家赵松均那种保守、落后的学究式态度，又构成了另一鲜明的对照。各种人物的精神面貌就是在这些矛盾和斗争中表现出来。老战、小冬子代表着新社会的新生力量，冲破了层层困难，获得了光荣的胜利；他们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给人们以巨大的鼓舞。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百花争妍的时代。我国现时代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有多少可歌可颂的共产主义的新型人物，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描写啊！特别是自从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以来，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继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又进行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高潮。在这伟大的革命、伟大的建设、伟大的时代中，我们的作家应该加倍努力，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创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理想人物，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文艺作品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只要坚定地沿着毛泽东所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就一定能创造出与这个伟大时代相适应的伟大作品，登上共产主义文艺的高峰！

註：

①《矛盾論》25、27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矛盾論》28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毛澤東論文藝》52—53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毛澤東論文藝》77—78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矛盾論》28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⑥許道琦：“对于文学创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討論的批判”（《七一》60年第2期）

⑦《毛澤東論文藝》76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⑧請參看1959年2月号《人民文学》14頁。茅盾同志在“短篇小說的丰收和創作上的几个問題”一文中的第三部分“关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中說，据他和若干方面接触后所得的理解，这种思想相当普遍。

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27頁，人民出版社出版。